

白城

档案文物

带你穿越历史长河，
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【九】

“嘎乌”是什么？

稿件：本报记者 李政孚

美编：刘健雄 供图：白城市博物馆

“嘎乌”，这个名字很陌生，但提到佛龕，很多人就明白了。嘎乌出现于公元17世纪，是藏语的音译，指护身佛的盒子，一般装有小佛像、印着经文的绸片、舍利子或高僧念过经的药丸及活佛的头发、衣服碎片等，相当于一个便携式佛龕。它承载着佩戴者的精神寄托，给予他们内心宁静、安慰和力量，在面对生活的苦难和挑战时提供心理支持。

白城市博物馆就有一件清代中期蒙古贵族佩戴的嘎乌，它长15厘米、宽11.5厘米、高6厘米。这件嘎乌银顶铜身，正面镶嵌一块半透明薄片，薄片下是一尊红色佛像，正面两侧是两条龙，下面为一只狮面神兽。据说红色佛像是用高僧的血和泥制作的。这件嘎乌的袋上绣有龙纹，黄色镶边。在清代，黄色是皇族及王公贝勒才可以使用的颜色，龙纹更是如此。因此这件嘎乌，很有可能是当时蒙古王爷佩戴的，它的发现，为研究白城地区的藏传佛教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。

关于嘎乌，还有一段传说。相传，有一位名叫扎西的年轻牧民，他家境贫寒、心地善良，一心向

佛。有一天，扎西偶然在集市上看到了一件精美的嘎乌，爱不释手，于是攒了很久的钱，终于拥有了这件嘎乌。他将嘎乌视为最珍贵的圣物，每天都会小心翼翼地佩戴在身上。有一次，扎西所在的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，牧草枯萎，牲畜死亡，人们生活陷入困境。扎西带着嘎乌前往寺庙，虔诚地祈祷。不久之后，天空竟飘起了细雨，随后雨势渐大，旱灾终于得到了缓解。

嘎乌作为具有宗教意义和文化内涵的饰物，质地有金、银、铜三种。盒面上多镶嵌有玛瑙、松石，并雕刻有多种吉祥花纹图案。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，佩戴的嘎乌在材质、工艺和装饰上有所不同。因此，嘎乌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嘎乌同样是家族的重要传承之物，一代代传递下去，承载着家族的历史、荣誉和精神寄托。对于远行者来说，嘎乌是家乡和亲人的情感纽带，给予异乡漂泊的人们心灵慰藉和归属感。

先民们将嘎乌随身佩戴，除沐浴更衣外永不离身。嘎乌是他们心中最珍贵的护身符，守护着生命、家庭、幸福和平安。



图为嘎乌



图为民国木花觚

花觚在握 万千花开

在白城市博物馆，陈列着一件民国木花觚。它通体为木质，口径7.8厘米、腹径7.2厘米、底径7.1厘米，是馆藏文物。

花觚的起源，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觚，原本是盛酒的容器。《周礼》记载：“爵一升，觚二升，献以爵而酬以觚。”后来逐渐演变为文房清供的一种。

宋元时期，花觚开始流行，起初为陈设瓷，后兼具插花用途。经明代嘉靖、万历两朝发展，花觚造型更加多样化。

制作木花觚常见的木材有黄花梨、紫檀、鸡翅木、酸枝木等。

民国木花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在工艺、造型和

装饰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发展。工匠们将传统的浮雕、透雕等技法与西方雕刻风格相结合，创造出更具立体感和层次感的图案；除传统的木质镶嵌，还引入了宝石、贝壳和金属材料进行镶嵌装饰，增加了花觚的华丽感和独特性；在传统的髹漆基础上，尝试新的漆色和漆面处理方法，使木花觚的表面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效果；运用不同木材的拼接组合，创造出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对比，展现出新颖的视觉效果；装饰图案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式图案，吸收了西方的几何图案和抽象图案等元素，使装饰更具现代感和时尚感。

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，木花觚是民国时期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见证，对研究民国历史具

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同时也体现了百年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新思潮的接纳。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，民国木花觚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，是珍贵的收藏品。

白城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民国木花觚，在战乱年代几经辗转，颠沛流离。百年的岁月，在它身上留下了痕迹，可能是色泽的变化、细微的磨损，然而，这些痕迹都成为它独特的历史印记。

曾经插在木花觚中花朵的芬芳，仿佛永远定格，历经百年的风雨洗礼，依然鲜活如初。那些与花觚和花香有关的瞬间，依然深深烙在历史的深处，挥之不去。

中西文化里的蛇

●曾泰元

在动物中，蛇有着特殊的原始地位，是远古先民的重要图腾之一，也被视为龙的原型。龙有蛇的影子，蛇有龙的样子，譬如东汉王充《论衡》：“龙或时似蛇，蛇或时似龙。”伏羲和女娲是上古神话中的人类始祖，其人首蛇身的形象频繁出现。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与神权关系紧密，青铜器上的蛇纹颇多，标志着蛇的神圣与尊贵。

先秦时期，蛇也象征国君，譬如《左传·文公十六年》：“有蛇自泉宫出，入于国，如先君之数。”蛇亦是吉兆。春秋时晋君出行，路见大蛇被伤，敷药救之，后蛇衔珠报恩，此灵蛇珠与和氏璧齐名，均是中国古代稀世珍宝的代表。

蛇虽是现实世界可见的存在，却给人以遥远神秘之感，是个受古人崇敬膜拜的瑞符。

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未收“蛇”字，仅收其古字“它”。“虫”字边的“蛇”是后起字，“它”才是“蛇”的本字。《说文》里小篆的“它”是个象形字，重点突出了“它”的蛇状：宝盖头上面的一点是细长的蛇信（蛇的舌头），宝盖头的主体是大比例的蛇头，宝盖头下方的“匕”是垂挂的蛇身及弯曲上卷的蛇尾。上溯到甲骨文，字典里各种写法的“它”，就更像是一条条具体而微的蛇了。

蛇有其为祸的另一面，清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上古草居，患它（蛇），故相问：无它乎？”上古人类居住在田野的

荒草间，担心有蛇，所以见面时会互问：没有蛇吧？蛇是洪荒时代人类生存的一大敌患，因此蛇也用来转喻邪恶之人，譬如元王伯成《李太白贬夜郎》第四折：“大唐家，朝治里龙蛇不辨。”大唐李氏在朝廷里好坏不分。

中国文化里的蛇，形象比较复杂，兼具神格，也具妖格，双面性突出。蛇图腾和青铜器纹饰是祥瑞，让先民崇敬膜拜。然而，自然环境里的蛇是一种安全的威胁，让先民忧虑害怕，后来也成为妖魔的化身，《山海经》《白蛇传》《聊斋志异》就记录了许多蛇妖的故事。

把蛇与龙并列，以龙为基准参照，可以看到蛇的地位有起有伏。最初，龙蛇互通，二者俱尊，用以比喻非凡之人，譬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一年》：“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”在深山大泽这样的非常之地，孕育着龙蛇般的非常之人。

后来，龙蛇出现高低分化，开始用龙比喻英雄，用蛇比喻凡夫。元马致远的《夜行船·秋思·乔木查》：“纵荒坟横断碑，不辨龙蛇。”任由坟冢荒芜，断碑横陈，英雄凡夫无法辨识。

高低分化更进一步，用龙比喻好人，用蛇比喻坏人，譬如《敦煌变文集·伍子胥变文》：“皂帛难分，龙蛇混杂。”黑白难分，好坏混杂，所贡献的成语“龙蛇混杂”深入人心，蛇的负面形象也就更加稳固了。

在西方文化中，蛇给人的联想多为负面。有两条来自西方文化的著名的蛇，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。一是古希腊伊索寓言故事“农夫与蛇”中的蛇，它成了忘恩负义的代表。二是传说中引诱夏娃偷摘智慧树果子的蛇，被认为是魔鬼撒旦的化身。在希腊神话中，还有蛇发女妖三姐妹，其中最知名的是美杜莎（Medusa），只要别人看她们一眼，就会立刻变成石头。另有九头蛇海拉德（Hydra），相传这个蛇身妖怪有九个头，砍掉其中一个头，会立刻生出两个头，是难以根除的祸患。

希腊神话中的蛇也有正面的形象，主要化身是蛇杖，影响广泛而深远，一直持续到当下。这里的蛇杖是有蛇盘绕的笔直节杖，分为单蛇杖和双蛇杖两个版本。

第一个版本是单蛇无翼的单蛇杖，是有“医神杖”之称的“阿斯克勒庇俄斯杖”（staff/rod of Asclepius），由一条蛇盘绕着木制节杖而成，这是医学和医疗保健的标志，世界卫生组织就用来作为徽标。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的医疗之神，常见形象是手持单蛇缠杖，对患者施以起死回生之术。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蜕皮，终其一生反复进行，象征再生与回春，体现了医疗的本质。

医神杖的蛇象征了二元对立的矛盾综合体，生与死，疾病与健康。就如同单词 pharmacy（药学；药房），在古希

腊语的意思是药也是毒，正所谓“是药三分毒”，药和毒互为表里。

第二个版本是双蛇有翼的双蛇杖，是俗称“商神杖”的“使者杖”（caduceus，本义“使者”），这是希腊神话的众神使者赫尔墨斯（Hermes）的节杖，也是罗马神话的众神使者墨丘利（Mercury）的节杖，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使者的标记。赫尔墨斯（或墨丘利）不只是众神的使者，也主管商业、贸易、谈判、旅游等众多领域，常被描绘为手持双蛇杖。这根节杖被两头相对的两条蛇缠绕，此意象与古人的蛇崇拜有关，如今观之，两条蛇或可视为交流的两个主体。杖顶有双翼，象征飞行的速度。然而一个普遍的现象是，这根双蛇的商神杖后来常被误作单蛇的医神杖，成为医学的象征，正统的医神杖反而受到了冷落，成了少数。

由此可知，在中西方文化里，蛇都不是全然负面的，而是善恶兼具。就像蛇有蛇毒，能致人死亡，但毒也可能是药，能救人一命。

